

大历史观视域下建构文化主体性的立足基点、逻辑结构和实践进路

陆卫明, 翁诗雨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立足大历史观研究文化主体性,实质是将这一课题置于世界历史演进的整体图景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的双重坐标,从历史规律的科学认知、中华文脉的自觉传承、人类解放的价值旨归三者辩证统一的意义框架中去论证构建一种根植于文化传统、回应时代课题、指向人类未来的主体文化的必然性,以谋求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大历史观视域下,古今发展演进的时间向度、中外文明碰撞相融的空间向度、内外部要素彼此融合作用的结构向度共同形塑当代文化主体性的存在形态。从时间向度来看,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文化演进的历史层累中形成的规定性和标识性;从空间向度来看,文化主体性是不依附且不排除他者文化的自主性和开放性;从结构向度来看,文化主体性是文化作为社会结构要素相对其他领域的独立性和决定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持续推进文化主体性的形塑并进行巩固,要求推动实现文化内核自我稳定和自我更新的统一、领导主体与实践主体的统一、文化新质生产力建设和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统一,这既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担当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任务,也是提升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历史观;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中国式现代化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巩固文化主体性”这一重大命题,并强调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1]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的社会历史坐标对文化建设规律作出的

重要论断,其中蕴含着大历史观的理论视域和立场方法。文化主体性是反映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所呈现出的文化表征和文化特性。借助大历史观中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的方法与视角,能为认识并阐释文化主体性的社会历史方位、内在规定性质和未来发展走向提供更为宽阔的视野和多维的分析框架,这对巩固并推进文化主体性建设、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引用本文:陆卫明,翁诗雨.大历史观视域下建构文化主体性的立足基点、逻辑结构和实践进路[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28(2):1-12.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3ZDA008)

作者简介:陆卫明(1964—),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E-mail:wmlu@mail.xjtu.edu.cn

一、运用大历史观研究文化主体性的 立足基点

大历史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展,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将当代中国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和现实问题放在世界尺度和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背景下加以研究,为的是能够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文化主体性”这一范畴的提出不仅是对文化领域建设规律的理论认识,更是基于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对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所提出的使命任务。因此,立足大历史观研究文化主体性,既能够根据人类社会规律研究文化主体性的演变机理,又能够立足中华文化的特点和规律确立文化主体性的规定性质,明确构建文化主体性的价值定位。

1. 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揭示了文化主体性与社会历史的本质关联

唯物史观决定了社会历史作为文化主体性的存在场域。马克思主义扬弃了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基于对人类历史活动的分析,富有洞见地把文化产生的根源归结为人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将这一独立的文化领域描述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及“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2]。文化主体性作为一种社会意识范畴的文化心理表征,其生成和演变过程并不是脱离具体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的精神活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所构成的社会历史结构形塑着文化主体性的形态和性质。因此,要将文化主体性置于人类具体的、历史的生产活动及现实的生存境遇中加以审视和考察。

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前提。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以希腊艺术和史诗为例,说明文化作为社会意识形式在历史进程中具有相对独立的演进方式和内在规律:“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3]34} 尽管孕育出此类繁荣文化的社会发展形势已成为过去式,但人类历史长河中诞生过的文化瑰宝和思想精华

作为“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3]35} 仍显示出永久的魅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4],一些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孕育而成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精神已经转化为流淌于民族血液中的文化基因,这些文化精髓成为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命脉,是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鲜明特性,是生成文化主体性的资源禀赋条件。

文化的历史承继性决定了必须在历史连续性的前提下把握文化主体性。恩格斯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以哲学和宗教这两个“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5]为例,阐述了每个时代发展自身的文化都必须以前人的思想资源和历史传统为出发点。文化作为一种承上启下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与经济基础并不总是同步平衡发展的,这种延续性特征决定了反映这一时代的文化不可能对先前传统作抽刀断水式的切割与决裂。这意味着,人们在漫长历史演进过程中所形成的诸如反映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风习俗等文化传统必将以极大的历史惯性推动历史车轮向前运转。因此,文化主体性是在历史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建构的,只有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连续性为前提,才能在时空中把握自身的内在规定和未来走向。

文化主体性的提出凸显了文化在推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的研究并不是纯粹为了建构关于文化现象的具体描述或者关于文明演进的研究,而是通过不同民族的文化模式来理解人类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道路和模式,从而“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6]301},以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恩格斯认为,历史成因的“最后动力”^{[6]304},即以意识形态或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个别人物动机和行动上,进而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动因。文化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化,以机制、价值、规范、图示等内在形式渗透于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一切领域,既呈现为相对独立的、外在的观念形态和精神形态,又作为经济运行、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内在价值维度和文化机理,是人

类社会得以进步的基本要素和内聚力。如果说经济、政治、技术、军事等社会运动是历史发展图景的宏观维度,那么文化主体性则是从微观文化机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的新维度、新视角。正如汤一介所说:“‘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7],文化上的自觉是对社会发展方向的判断。因此,文化主体性建构的要旨在于考察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赖以生存、共同生活、生生不息的社会文化根源,发挥文化化解社会矛盾、凝聚社会力量、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重要作用。

2. 现实基础:新的历史方位塑造了构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实践需要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激活和发展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底蕴。中华文明所提出的思想原则和文化传统至今仍在影响现代人的思想情感和价值取向,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在全球的延展开启了世界历史,无论是以殖民或战争为支点的文明冲突,还是以和平交流为形式的文明互鉴,各民族多元文明打破地域限制,进入相互交融、相互促进时期。中国融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也是中华文明实现转型的过程,中华文明在此期间经历了短期的衰落与颓败,但始终未退出历史的舞台,在中华民族的变革实践中实现了重生与再造。当前,世界范围内正在经历一场大范围、深层次的变革,被纳入世界历史潮流的各个民族国家形成了相互依存的新型关系。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长期低迷、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地区冲突持续加剧,以西方占主导地位、以西方价值观为主要取向的世界格局已难以为继,西方的发展理念、治理体系、文明形态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时代潮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焕发的蓬勃生机有力印证了中国正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各个国家能够走出与自身相适应的多样化的、独特的发展道路^[8]。立足于文化主体性建设,是发挥主体能动作用、挖掘和激活中华文明潜藏的资源 and 智慧、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途径。

从民族发展的角度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与成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缺乏对自身文化价值充分肯定和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充分自信的民族和国家是无法生存和延续的。文化主体性的形态表征由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进而迈向文化自强,背后是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现代化进程所决定的。如今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方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形塑着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诉求。“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⁸其一,从文化引领力的需要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探索出一条有别于西方工业化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之所以能以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和发展模式引领时代发展潮流,是因为其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转型时代所面临的共同命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贯穿优秀传统文化精髓、革命文化精神谱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及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在此基础上所生成的反映时代主题的文化主体性为纾解现代化危机所呈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紧张关系提供了源于时代而又高于时代的先进理念,形成了独属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特性。其二,从文化凝聚力的需要来看,文化体系的普遍开放必然伴随着多元价值和意识形态的激烈交锋。对一个民族国家来说,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并非凭空造就,现代化价值体系的建构要求立足本民族主体文化的价值阐发,最大化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普遍认可的价值共识,以抵御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袭。其三,从文化塑造力的需要来看,为实现新的文化使命,必须立足文化主体性,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与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充分调动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培养塑造文化的民族性自觉与世界性观照,解决“古今中西之争”,不断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其四,从文化辐射力的需要来看,为进一步加强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舞台的辐射力,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这就要求基于文化主体性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形成中国特色叙事体系和话语体系进行阐释并

加以示范引领。

3. 价值立场:文化主体性必须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立场

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主线和价值规定是大历史观的内在要求。在大历史观视域下,文化的创造、生成和积淀正是人的本质的历史生成和展开,文化主体性的发展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内在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人正是在改造世界的对象化活动中,不断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同时在这种活动中“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9]。因此,人民作为价值主体,是文化主体性构建的根本规定,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和发展必须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

文化主体性的价值取向要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人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能够凭借实践活动摆脱生物本能的规定和异己之物的束缚,人不应被视为如同物一般的工具和手段,而是目的性和价值性的生命存在。然而,在阶级社会,文化的进步成为异己的力量剥削和压迫着被统治阶级,“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10]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为少数贵族和精英阶层垄断。传统民本思想固然对政治统治秩序的巩固和民众主体地位的提升起到历史的推动作用,然而,其阶级局限性将人置身于一种特定的统治与服从的社会关系,忽视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汤一介指出,“‘民本’思想是建立在蒙着一层温情脉脉的‘恩赐’观点之下。”^[11]^[14] 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则体现在文化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相背离,其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原则使得人类主体性落入新的异化和物化的窠臼之中^[12]。文化沦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工具,沦为维护反动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3]^[59]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揭示出文化进步与人的自由之间的本质关联,指出“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

一步。”^[13]从这个层面来说,文化主体性的实质就是人的本质不断显现、主体文化不断生成的过程。因此,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的“主体文化”要实现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成的异化的“客体文化”的超越,其价值导向必须和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最高目的和价值相一致,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和发展必须超越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统治的形而上学主体困境。近代以降,主体性成为近现代社会的价值规范基础和文化根源,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质。西方传统哲学将主体性问题限定在认识论范畴内,把主观意识的“自我”实体化为主体,把自我之外的他者规定为“客体”。海德格尔曾这样概括:自笛卡尔以来,“‘我’成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它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14]近代以来西方哲学主客体二分的思维模式将个人主体的“自我意识”置于中心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互为对象性而非主体间性的关系。从文化的视角看,随着以自我意识为本位的主体性的确立,一方面,必然导致价值个体主义的兴起和价值共识的文化危机,从而使社会生活统一性失去普遍性、公共性的精神基础和价值规范,致使文化共同体无法形成持续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陷入历史虚无、文化虚无的价值分裂,难以确立起现代社会的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必然导致普遍主义对文化多样性的排斥。理性形而上学宏大叙事的普遍主义倾向,往往以某种超时空而非基于历史传统的抽象前提为原点,预设出一套普遍适用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进而推演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制度和文明形态。因其脱离具体历史情境,在此意义上的主体性实质蕴含着一种充满压制性、排他性、垄断性的专制话语。其表现在文化领域就是以自己民族国家的主体性为中心,将他者主体性视为附属和征服对象的文化中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马克思以实践为立论基础的主体性哲学实现了对形而上学主体性的超越,主体性不是封闭在自我意识内部的、静态的存在,而是在感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范畴。因此,文化主体性的构建和发展要摒弃二元对立

的思维模式,在与他者文明的交互实践中主动适应环境变化并作出调整和发展,在坚持自身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倡导多元文化的平等共存和相互尊重,建立人与自然、社会、自身等关系的和谐样态和价值规范,构建多元文化主体之间平等共生的交往模式。

二、大历史观视域下把握文化主体性的逻辑结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党和国家的事业要从大历史观的视域加以认识和把握,要“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15]。在大历史观视域下把握文化主体性的逻辑结构,要以长远的历史视野分析文化主体性的演变历程,以探究本质规定;要以宽广的全球视野把握文化主体性的发展走向,以顺应世界大势;要在确定的时空坐标下以深层的结构视野剖析文化主体性的要素特性,以赋能时代发展。古今发展演进的时间向度、中外文明碰撞相融的空间向度,内外部要素彼此融合作用的结构向度相互联系、彼此依存、由表及里,共同形构着当代文化主体性的存在形态。

1. 文化主体性的时间向度

从时间向度来看,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文化演进的历史层累中形成的规定性和标识性。大历史观强调要将研究对象置于纵深历史长河,以更大的时间跨度贯通把握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整体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112]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萌芽与形成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从自信到自强的历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中华民族出于文化自觉根据自身特点、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对基于不同时间跨度的历史层累而形成的文化资源所作的价值选择。

在近代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碰撞、融合之前,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历经数千年发展已经呈现出从自发形成到自觉发展的主体体系。文化

的自发状态是文化主体性的初始阶段。列宁认为,“‘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16]317}文化自发是指中华民族的先民出于生存和繁衍的需要,在经验、常识、习惯等自在的文化要素驱使下自发地开拓自己的文明,是一种暂未对客观事物产生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缺乏明确的自我意识的精神状态和行为状态。中华文明承载和积聚了相对巨大的人口规模,拥有相对其他在较小地理范围内展开的古文明所难以企及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距今四五千年,华夏部族以中原华夏地区和华夏族的文明为核心,与周边的区系文明相互融合而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展现出中华文明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整合性,在此进程中产生的“华夷之辨”是一个民族自我认知与身份界定的集中体现,标志着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开始成形。稳定性、连续性、包容性、整合性、创新性,这些特性是构成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前提基础和禀赋条件。

文化自觉发展的主体性体现在中华文明具有的独特文化基因和理念体系所形成的区别于其他文明形态的文化规定性和文明标识性,这是构成文化主体性的核心要素。陈来认为,追溯中华文明的思想根据不应回归文明形成之初,应基于轴心时代特别是中华文明发展到成熟期所呈现的精神内涵^[1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五千多年历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形成了深刻的思想体系,表现为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发展而来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汤一介统合道家、儒家和禅宗的思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可以概括为追求“普遍和谐”,其中“崇尚自然”“体证生生”“德性实践”分别追求的是自然本身、人和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人本主义、辩证思维、理性主义为典型特征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已经凝结成中华民族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特性,长期影响和支配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初步形成^{[11]197-203}。

文化自信的主体性体现在文化禀赋层面深刻的自我认知,是中华文化主体性逐步走向成熟的表现。近代以前,中华文明在形成过程中也受到域外文明的影响和冲击,但都没有对中

华文明的文化根基造成威胁,最终是吸收了域外文明的有益成分内化成中华文明的要素之一。然而到了近代,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并不是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内生性过渡和转变,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压迫和冲突中被动开启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这种特殊的转型模式使得以农耕经济为依托生长起来的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受到来自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使得原本应以历时的时态呈现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及其基本的文化精神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费孝通认为,只有“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18]。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和传统文化的衰落,马克思主义者秉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的方法,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及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都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开始实现对西方文化的祛魅,从文化失落到文化自信的转变体现出中华民族对文化的自我认知愈发准确、文化主体性逐渐成熟。

文化自强的主体性是由自觉的观念的主体性向自觉的行动的主体性的过渡。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建设中华文明,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的飞跃,体现的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发展到自立自强、自我超越的阶段态势。作为伟大思想解放的“第二个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内涵和生命力,将传统概念转化为适配现代语境和解决时代问题的文化资源与治理智慧,催生出新的理论形态、价值表达和文明样态,使其焕发新的活力和影响力,实现了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型和文明接续,形成了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世界发展潮流的文明新形态。

2. 文化主体性的空间向度

从空间向度来看,文化主体性是不依附且不排斥他者文化的自主性和开放性。中华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禁锢封闭的体系,正

是在与周边各民族文化相激相荡、与外来文化冲突融合中整合形成且不断发展演变。文化主体性的构建在于以世界历史的空间视野处理与他者文化、与客体环境之间的关系,推动不同文明实现共存与交流。

保持文化主体性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汤一介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要有文化的主体性……一个没有能力坚持自身文化自主性的民族,也就没有能力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以丰富和发展其自身的文化,它将被消灭,或全盘同化。”^{[11]23} 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正在于其同化力、融合力、凝聚力,这也正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体现。近代以来,传统形态的中华文化主体性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濒临解体,中华民族在文化认同上也因失去对象而出现危机,如何应对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矛盾,一度形成了“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文化本位论”“折衷论”^[19]等派别。然而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种种方案也因未能真正重构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构筑文化自信赖以依托的文化主体性而走向破产。原因在于,这几种流派或包含深厚的崇古拟古的文化心理情结,或转为对西方文化急功近利囫圇吞枣的文化自卑心理,用传统的体用之争、文明高下掩盖了中西文化的深层隔阂、回避了文明形态之间的内在冲突,没有挣脱文化中心论、文化优越论的窠臼。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新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使得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走向更深层次的融通。可以说,只有树立了正确的文化主体意识才能理性辩证地认识自我和他者的文化,在激发本民族人民的文化认同和与其他民族文化平等共生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与横向联通。

文化主体性只有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才能得到巩固和新的发展。在马克思那里,主体之为主体性的根源不在于自我意识,而是由人的现实的对象性活动引起的主体与主体的交往关系所决定的。因此,随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文化主体性不是由主体自身决定的,而是在文化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中形成和巩固

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而言,一方面,从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出发,要秉承“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观点。过去,由于“西学东渐”的浪潮在封建社会晚期被人为阻隔,中华文化一度丧失了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时机而陷入主体性衰落的文化危机。现在,建立在传统意义上具有封闭的、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正在被建立在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相互交往基础上的文化主体性所替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20],与他者文明平等交流互鉴的前提是正确认识不同文明客观存在的差异性。无论是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还是福山主张的“历史终结论”,都具有明显的民族偏见性和强烈的政治意图。要找到共存的文化资源,寻求文化认同,破除文化壁垒和精神隔阂,为不同文化深层次交流对话提供契机。另一方面,文化主体性的构建要基于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潮流,回应、解决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从大历史观的视野观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处于“全方位对外开放阶段”,世界各国形成了一个关系错综复杂、命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任何国家民族所要解决的不只是自身社会的问题,而是要面向整个人类社会,要吸收各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经验和智慧。当前由于缺乏全球性的价值和文化共识,全世界范围内已然存在经济发展鸿沟、政治对立丛生、恐怖主义事件频发等全球治理困境,文明交流互鉴也因此被视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要素。

3. 文化主体性的结构向度

从结构向度来看,文化主体性是文化作为社会结构要素相对其他领域的独立性和决定性。从内部结构看,文化主体性是造就各种文化要素有机融合形成、具有独特价值内核和文明结构的“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前提基础。从外部结构看,文化主体性是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相对其他领域而言的独立性、自主性,以及与其他领域相互作用过程中的能动性、决定性,拓宽了观照社会历史发展和探究社会运行本质规律的认识维度和观照视角。

从内部结构看,文化主体性要求在各种文化因子融合的系统结构基础上形成中华文明独有的精神特质。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内核在于扬弃了西方现代文化的资本逻辑,开创了一条以人民至上为根本价值立场的文明道路。中华文化主体性正是建立在这一文明特质和价值根基上,支撑起具有系统性和协同性相统一的文明结构:其一,文化主体性突出了各文化要素集合的系统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主体性“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8-9}。其中,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根脉”,为文化主体性的系统建构提供思想路线和方法论的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魂脉”,为文化主体性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历史积淀;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现代化进程实践中为文化主体性的构建提供现实前提和实践基础;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则为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提供资源补充和借鉴。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历史、文化、实践结合起来,通过“两个结合”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古今中外”的文化要素转化为符合现代要求的文明资源,主张在不同文化体系之间形成一种相互补充且共生的关系,使得各类异质文化要素突破了原先的形态,在组成要素、功能结构等方面都实现了深层次的重构,实现了对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和文明接续,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构出内生主动型的文化形态和发展图景。其二,文化主体性突出了文化要素之间的协同性。这种协同,体现在文化系统内部的价值理念、伦理规范、制度结构、符号象征、知识体系等文化要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构成了一个动态调试、共同演进的有机生命体。知识体系的革新可能冲击原有伦理规范,促使价值理念进行新的阐释,进而推动制度结构的调整,并最终催生新的符号表达。正是这种深层次的有机系统,使得中华文化在面临变化的时代需求和外来挑战之际能够在保持内核稳定的同时,灵活调整内部要素关系以展现强大的文化韧性,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从外部结构看,文化主体性要求重视并提高文化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依照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文化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是由作为第一性的经济基础所派生和决定的。然而,若只是机械化庸俗化地将文化的作用限定在对经济的反作用上,而忽视了文化与经济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乃至相互决定的作用,就会陷入单线型的理论解释范式。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明确提出“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21]的观点,认为作为第二性的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化为主要的决定作用。一方面,唯经济论者认为只要经济好了其他一切领域产生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的观念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曲解与偏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若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不加强正确价值理念的引导,商品经济所固有的消极属性、反映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价值观念则会大行其道,这也是文化主体性建设应有之义。另一方面,文化不仅要跟上经济基础的建设,还要赋能甚至引领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停留在把文化视作经济社会发展的补充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22]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经济发展必须由传统的物质资源拉动转向为精神和物质资源双向拉动,人的创造性思维和精神生产活动逐渐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变量,这一全新的经济发展范式背后蕴藏的是人类社会正在逐渐摆脱对物的依赖性而走向全面自由发展的必然逻辑。同样地,在内政外交的舞台上,共同富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富有中国特色且卓有成效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彰显出天人合一、民为邦本的价值主张和治理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等重大主张和命题的提出为纾解世界困境提供了新的方案和走向,折射出中华文化以和为贵、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和正义追求。这些理念背后承载的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繁衍生息、历久弥新的生存智慧和政治哲学,是文化与经济、政治在现代化进程中相互交融、相互赋能的

鲜明印证,这些正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有力体现。

三、大历史观视域下巩固和发展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进路

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文化是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产物。在大历史观视域下,文化作为对象物的可塑性、人的主体力量的生长性、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性决定着文化主体性在历史长河和实践场域的形态变迁。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巩固和发展文化主体性需要接续历史文化基础,巩固文化内核,实现文化自信自强;明确文化主体,发挥领导主体与人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践场域,推进文化新质生产力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不断焕发出引领时代发展的鲜明主体精神与强大文化力量。

1. 文化内核:实现文化自信自强

文化内核是文化深层次的精神特质,实现文化自信自强是文化主体在面向文化客体进行改造实践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进取性状态,这种文化意识建立在文化内核持续不断的自我稳定和自我更新的基础上。

(1) 巩固文化内核的自我稳定性

巩固文化主体性首要是巩固文化内核的自我稳定性:一方面,从内生性角度出发,文化内核的塑造并不是某个特定历史阶段文化思想的拿来主义,而是需要以阶段性与连续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原则统合好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进程、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历程中生成的文化资源。全面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行中进一步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总结概括出具有广泛影响意义与现代意义的反映中华文化主体内核的核心理念、思想精华与话语符号。在追溯原初性内涵和精神性价值的基础上挖掘其在新时代语境的价值内涵,并通过精神再现、语境再植、载体更新做到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反思性重构和创新性诠释,以增强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内部成员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感和情感凝聚力^[23]。另一方面,从外源

性角度出发,文化内核的稳定体现在面对异质文化的冲击与交融能够保持文化主体的稳定性。在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文化的交互过程中,要坚持总体性文化和多元性文化相统一的文化建设原则。就前者而言,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总体原则要求站稳中华民族立场,捍卫中华文脉,着力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厚植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警惕和批判有关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对精神文脉的侵蚀与解构,在思想理论、价值观念、知识体系、心理意识等层面铸牢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后者而言,面对共同体中不断生发的多元文化因素,开放包容的前提是能够创造基于多样性共存的持久性关系,形成彼此相融共生的空间,使各类文化之间能够做到各有所长、各补其短、厘清差异、发现契合、实现创新。在这一点上,“第二个结合”为两大生发于异质文明的文化彼此成就出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了方法论原则,也为多元文化的交融互鉴打开了创生空间。

(2)建构文化内核的自我更新力

发展文化主体性要求形成文化内核的自我更新力。主体性作为一种关系型范畴,文化主体性的发展是文化自我与他者及世界关系的交互性构建;其一,发展文化主体性需要凸显对时代和现实问题的关照。文化反映一个时代内在精神和灵魂,同样对现实社会具有深刻的指导和引领价值。文化主体性的自我发展要求必须找准历史纵深和现实关切的结合点,能够通过内部调整和外部吸收,不断适应环境变化,保持文化内核的生命力。其二,发展文化主体性需要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文化作为“自然的人化”,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文化主体性从自发自知再到自觉自强的文化样态反映的是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彰显,因此文化主体性的发展与人的本质实现具有内在一致性,文化内核的发展更新程度必须以现实的人获得自由和解放的程度为尺度,以人的目的、愿望、知识、意志等精神需求的发展水平为依据,以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全面和谐的文明进程相一致,实现合规律和合目的的统一。其三,发展文化主体性需要拓宽文明交流互鉴的路径。交流互鉴

作为保持文化内核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活力源泉,一方面,实现互通的前提条件在于凝聚价值共识,形成对话空间,建构自身的价值主张和话语体系,使其作为反映当代国家和民族在外交实践和文化传播中的价值取向,在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寻求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的价值共识和利益愿望等通约属性。另一方面,促进互鉴的关键路径则是面向现实场域共同探寻全球性挑战和问题的解决之道。当前,人类仅仅依靠单一文明的力量难以应对诸多风险、解决各种挑战,只有尊重文明多样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取出对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性问题有益的经验 and 智慧,借鉴不同文明的价值和智慧,才能在多元文化交互实践中锻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主体性。

2. 文化主体:发挥主体力量的主观能动性

文化主体是建构文化主体性的主体力量,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主体,决定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性质和发展方向;人民群众是实践主体,决定文化主体性发展和变革的深度和广度。

(1)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

文化领导权关涉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性质和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正,“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1][1]}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文化生产方向;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先进文化的践行者,能够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价值自觉承担起新的文化使命。因此,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要加强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其一,主导权意味着要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思想文化的阵地建设。必须持续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完善舆论工作引导机制,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扩大文化认同和价值规范的社会基础,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稳定和巩固。其二,管理权意味着要建立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形成党委统一领导、部门通力合作、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格局。包括完善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体制和责任机制,规范文化政策法规体系,以政治力量介入弥补文化资源

在地域之间的资源差异,加快思想文化工作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凝聚文化发展的力量。其三,话语权意味着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文化领导权在现实场域的运行效能愈加指向人民的自愿认同而非强制服从,文化主体性的推进关键在于政党在文化领域的理论说服力和话语感召力。一方面要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建设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增强创新理论对现代问题的解释力和对时代进步的引导力;另一方面要构建完善最新理论成果的话语体系,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核心理念和思想体系,要创新传播载体,以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促进广大群众的思想认同和广泛支持,逐步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

(2) 保障人民群众在文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文化主体性是人民主体在创造性转化过程中形成的意义建构过程,必须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文化自觉性,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其一,文化自觉性建立在文化认知和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列宁在面对当时工人运动中存在的盲目崇拜自发性倾向时,认为工人阶级单靠自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必须重视“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16]325}。同样地,文化自觉并非一个无端生发的过程,而是需要借助意义诠释和信息传递机制使得人们能够对符号承载的文化资源进行深度理解和主动阐发,使其能够深刻认识文化地位作用、正确把握文化发展规律、主动承担文化历史责任。其二,激发人民群众文化创造力。文化创新离不开贯通古今、融通中外,需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学习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将其作为文化资源和提升空间;运用科技手段激发文化创新形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建立健全文化创新激励和保障机制。其三,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对此,要为人民提供更普遍的公共文化服务、更均衡的公共文化资源、更优质的文化产品、更协调的制度安排,促进人民物质需要、社会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协

调发展,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提升,以更为包容的态度尊重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精神需求和创造。其四,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立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基本点,充分了解人民文化需求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持续推进文化形式、文化载体、文化活动创新。

3. 文化场域: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践依托
中国式现代化为文化主体性的演进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要持续通过产业优化、技术创新、体制革新不断突破文化发展的藩篱,为文化主体性的发展创造物质条件和制度基础。

(1) 推进文化新质生产力建设
生产力是社会文明的基础,不同性质和形态的生产力及其构成要素和组合方式决定了文化主体形态。新质生产力作为当前社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力形态,以创新为主导推动科技引领与文化发展的全链条深度融合,将从根基上激活中华文化的内生动力,促进中华文明形态更新、推动中华文化主体性整体构建^[24]。其一,以新质生产力提升文化内容生产效能。在文化生产方面,应借助人工智能、交互设计和虚拟现实等技术,通过建设完善文字数字化基础设施,加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进行创造性重构和创新性表达,使文化资源得到数字化的深度挖掘和统筹整合;在文化创作方面,利用生成式预训练等新型生产工具赋能文化主体以更强的创作能力,生产更多样化、个性化的文化产品;在文化传播方面,借助社交平台、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媒体技术为文化传播提供新的表现形式。其二,以新质生产力加快文化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提升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人才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在数字化、智能化浪潮下,在文化领域要加大对多种专业技能复合型人才引进力度,优化优秀文化人才培育体系,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要推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向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等重点行业汇聚;突出数据要素作为新型要素的价值,推动传统文化产业向以数据和网络空间为载体的新兴产业转型。其三,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文化产业深度转型实

现高质量发展。通过跨界合作、产业协同等方式推动文化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促进融合性文化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不断涌现;引导新质生产要素向传统文化产业链条深度渗透、衍生,推进传统文化产业向数智化转型升级。

(2)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破除文化发展结构性深层次障碍、建立具有主体性意识的文化形态的重要途径。其一,落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配套体制机制。围绕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从根本上保证文化主体性的性质和方向;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机制,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建设,改进创新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机制,细分化建立健全道德体系机制,进而带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多维引领和价值落地。其二,兼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和现代文化产业、市场体系构建。就前者而言,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需要实现从以政府为改革主体的“单一主体”管理模式向由社会、公众等更多主体参与的“多元主体”治理模式转变,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制度。就后者而言,各级政府需要加大财政、税收、金融、社会保障、土地使用等方面对文化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和文化生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打破区域限制、行业壁垒、城乡分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达到文化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其三,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文化立法要求界定国家、民族、公民等多元主体的文化权益和文化责任,提升文化立法对文化产业、文化企业、文化作品的价值约束和经营规范,是明确价值导向、巩固国家民族文化成果、规范和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现代治理形式。其四,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统筹和打通网络内容生产和传播各环节领域,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80.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8.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汤一介.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126.
- [8] 李武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中的中国式现代化[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9(5):12-28.
-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74.
-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11.
- [11] 汤一介.中国传统文化的的特质[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
- [12] 贺来.“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12.
-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0.
- [14]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882.
- [15]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4.
- [16] 列宁.列宁选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7] 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4.

[18] 费孝通. 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248.

[19] 曾乐山. 中西文化和哲学争论史[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13.

[20] 习近平.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 第一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97.

[2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22.

[22] 杜尚泽, 潘俊强. 总书记关注的这个题目, 有中国的未来[N]. 人民日报, 2023-07-10(01).

[23] 陆卫明, 邓皎昱, 王文辛. 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的提炼及其价值[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21(3): 17-28.

[24] 陆卫明, 王子宜.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J]. 探索, 2023(5): 14-25.

The Foundational Basis, Logical Structure,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Construct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cro-History / LU Weiming, WENG Shiyu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Cultural subjectivity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with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Study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from a perspective of macro-history essentially places this topic on the dual coordinates of the overall picture of the evolution of world history and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carried ou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laws, the conscious inheritance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human liberation. To demonstrate the inevitability of constructing a subject culture that is rooted in cultural traditions, responds to the issues of the times, and points to the future of humanity, aiming to seek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cro-history, the time dimension of ancient and modern development, the space dimension of the collision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ivilizations, and the structural dimens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lements together form the existence form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subje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cultural subjectivity is the prescriptivity and identification of a country or nation formed in the historical layers of cultural 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cultural subjectivity is the autonomy and openness that does not depend on or exclude other cul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e, cultural subjectivity is the independence and determination of culture as an element of social structure compared with other fields.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format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requires promoting the unity of self-stability and self-renewal of the cultural core, the unity of the leading subject and the practice subject, the un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reform of the cultural system and mechanism. This is an important task to promote cultural prosperity, build up strength in culture, and assume a new cultural mission. It is also an essential part of enhancing cultural consciousness, strengthen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realizing cultural self-improvement.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macro-history; cultural subjectivity; cultural self-improvement; Chinese Modernization